

汪

WANG

晖

HUI

自

汪 晖 著

跨

世

纪

学

人

文

存

选

集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学人文存

汪晖

自选集

汪晖  
著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学人文存  
汪 晖自选集  
汪 晖 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89×1194 1/24 印张:16.5 插页:2 字数:381千字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500册

ISBN 7-5633-2482-8/I·219

---

定价:(平)29.50元  
(精)38.00元

## 出版说明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的蹈厉，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他们在80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尚不能对自身的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崩溃的开始。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国这一批新学人，多是这样的“心忧”之人，当其激切之初，曾蹈厉

于良知的煎迫；当其冷静之余，又沉潜于学理的涵泳。这样的“心忧”，是学界的好传统，也是中国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他们的学术自选集、也许不一定能呈示其学术全貌，但肯定能够突出体现其宝贵的学术品质。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希望这样的品质能够在 21 世纪的中国学人身上传承下去。

“跨世纪”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并不是说未被列入“跨世纪”的人就无权迈进下世纪的门槛。“跨世纪”只是意味着，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昌明与辉煌有着多么热切的期许，以及基于这热切期许而履行的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自觉的肩负。没有这样的自觉，便没有迎接新世纪的真正准备，也就没有了开创未来的现实基础。丛书收入的，都是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著述，我们想：人类存在的价值，其终极尤须以人文的尺度来衡估。

90 年代的沉潜，也许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样的转型是承前、也是启后。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出版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旨在尽我们的薄力，倡学术之昌明。

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九七年九月

# 自序

我至今相信,认知历史的基本动力之一是认知我们自己。但是,许多时候,也正如尼采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认知者对自己仍然是陌生的。在漫长的读书生涯中,我们总是在求知的途中奔忙,难得回过头来问问自己:我们是怎样成为现在的自己的?作为行动者,我们并不能通过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来呈现自我,而只能通过我们对待各种事物的态度来表现我们自己。我们取舍事物的方式本身,决定了我们是谁。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理解自己,我们的永恒定理是“每个人都最不了解自己”,——这就是尼采告诉我们的宿命。

在人们无法确认自己的时候,认同问题就出现了。从许多方面看,寻找认同的行为是有历史前提的:首先,由于传统社会制度和伦理结构的瓦解,我们的社会角色本身不再能提供道德评价的客观基础和理解我们自己的条件;其次,对传统伦理制度的反叛伴随着新的自我观念的产生,即我们普遍地相信存在着某种内在的本质或我们的自我,而这种内在的本质显然与我们的实际社会状态相脱离。只有现代社会使我们同时面对这两个前提。因此,寻找认同也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确认自己的行为,而要完成这个行为就必须重建认识自己的框架,就如同古代人用“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结构理解自己一样。确认自己不只是一个心理行为,而且是一个社会行为。重建新的意识结构是和重建新的社会结构同步的。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重新确认自己不是个人成长过程中

的自然事件，而是一种集体命运。“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变，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挤击，而已消沦于不知不觉之间……”这是陈寅恪悼念王国维自尽时说的话。“纲纪之说，无所凭依”，显然是说，“纲纪”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必须以特定的社会制度及其实践为依托。在陈寅恪的眼中，王国维乃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诚然体认“纲纪”，但由于丧失了“纲纪”的社会实践的基础，因此个人的文化信仰本身并不能建立起生存的意义，他终于与这种文化“共命而尽”。在这样的叙事中，王国维的死成为一种象征：在丧失了实践自身的制度基础之后，中国文化无可挽回地陷入了悲剧性的命运。

然而，以死来保持文化认同上的完整性的人只是极少数。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需要的是自我认同的重新确认。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获得生存理由和生存意义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主动与被动相交织的过程，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充满了试探的兴奋的过程。持久地追问我们自己是谁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人人都能承担。像王国维那样以死相许，像鲁迅那样彷徨于无地，都需要惊人的毅力和彻底性。彻底性，这是现代人最最缺乏的品质，也是我自己缺乏的品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认同问题不存在了。不，认同问题是存在的，即使这个问题不是以追问“我是谁？”的方式出现。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追问这个问题：人们正在从事怎样的社会实践？

这本书是对中国现代认同问题的探讨。我已经说过，认同问题不是或不仅是一个个人心理学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总会表现为一种个人或者集体的心理倾向和价值判断。每个人的自我确认，需要各种资源，因为我们是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之中确认我们自己是谁，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周围的世界。因此，当我们开始追问我们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总是在问：我们自己与自己身处的社会、国家、世界以至自然界的 关系怎样？社会、国家、世界和自然是抽象的概念，在这些概念的背后，

是具体而复杂的感情、道德、法律、审美和信仰的关系。因此,对现代认同问题的检讨,不仅会涉及到自我、个人的观念,而且会涉及社会、民族、国家和自然等观念,现代道德观和政治理念的形成,正是以这些复杂的关系为基础的,因而政治和道德的分歧其实也来源于这种认同的差异。

本书当然不是对全部中国现代认同问题的研究,而只是一本专题性的论文集。我有意识地选择了与现代认同问题有关的论文编成一辑,特别地集中在个人观念和自然的观念(通过科学观念的检讨)方面。有关社会、国家观念的问题在有关论文中或有涉及,但没有专门的讨论。这是我将要做的工作。在我的研究视野中,自我/个人、社会/国家/民族、宇宙/自然等几组关系,构成了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基本框架。

我对认同问题的上述理解也决定了我的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取向。详细的讨论见于本书的第一篇文章的第四部分。简单地说,我的基本方法可以视为观念史与社会史的一种结合。在观念的领域,我特别地注意核心概念的历史演变,在近代这种演变还涉及到一个跨语言的研究领域。换句话说,我不把个人、社会、国家等概念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翻译或者本质规定,而是把这些概念本身视为一个历史建构的领域。不同的个人、不同社会中的不同的思想家、同一个社会语境中的不同的知识分子,拥有不同的个人、社会、国家、自然的观念。在观念史的层面,这些概念相互间的关系的差异,决定了同一语词的不同用法。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语境中显示出历史的含义,因此,我们不可能脱离这种语境来理解这些概念。例如在近代欧洲,社会概念作为一种历史产物,与市场、教堂、资产阶级家庭、行会组织以及现代国家具有内在的联系。在晚清社会,社会的概念与特定的士绅—村社共同体,特别是家族体制关系密切,当时的城市社会团体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也颇为特殊。从语词角度看,社会概念是 society 的翻译,但是社会与 society 之间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个鸿沟是由社会历史的结构性差异决定的,而不是由某种现代学科如社会学或政治学的理论所规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牢记,在从事文化和社会研究的过程中,将另一个文化中的词汇运用于自己的社会文化实践时,这个行为绝不能简单地被视为“翻译”行为。在同一个意义上,用其他社会的理论范畴



作为研究自己社会的描述性范畴,是一个布满陷阱的困境。不过,我并不认为“翻译”行为毫无意义,相反,一个基本的共识是:这种“翻译”的不可能性本身,证明了翻译的必要性。我这里所指的翻译,不仅仅是指文字的翻译活动,而且是指文化的交往活动。通过这种文化的翻译(交往)活动,翻译主体获得了什么?被翻译的主体又获得了什么?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问题之一。

晚清以降,中国卷入了现代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复杂而深远。从现代民族国家和共和政体的建立,到士绅—村社共同体的瓦解;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位置的变化,到现代家庭的形成;从科举制度和传统知识体系的解体,到现代教育制度和知识的理性分化;从传统书面语的废弃,到以白话文和普通话作为现代标准汉语……所有这一切被韦伯称之为“理性化”的过程改变了社会的整体结构,也导致了“纲纪之说,无所凭依”的局面。问题是重建纲纪所依凭的社会基础,还是彻底破除旧轨道,建立“新”世界?王国维与他所认同的文化“共命而同尽”,更多的人则相信,“现代”孕育了未来,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我们正通过历史的进步走向未来。然而,世界性的社会实践正在瓦解持续了二百年的乐观主义。从政治、道德、文化和知识等各个领域,许多思想家发现现代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

对现代性的反思包含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取向,也体现为不同的历史叙事。中国的传统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异口同声,他们证明的是现代社会及其思想恰好是危机的主要来源。与他们相对立的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者或启蒙主义者坚定地相信,现代性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现代社会的危机不过是“方案”尚未完全实行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我的看法与上述各种看法都不相同,虽然具体地说来又各有交叉。

概略地叙述虽然难以深入,但我的经验使我相信,扼要的说明也必不可少。

我要说的第一点是,迄今为止,中国的现代历史是被现代性的历史叙事笼罩的历史,传统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启蒙主义对现代性的批评或坚持,都是以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为前提的。因此,在讨论中国的现代问

题时,需要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分法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持久主题,也是中国现代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在我的历史叙事中,我只是将它们作为主题来处理,而拒绝将之作为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

第二,在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中,个人、科学、社会、国家等现代主题被安置在传统/现代的叙事框架中,因而它们是作为现代的标志而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然而,在我的历史叙事中,这些主题本身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和紧张,这种矛盾和紧张不只是来自传统/现代的对立关系,而且来自对现代本身的深刻怀疑。科学观念与中国天理宇宙论的关系复杂而暧昧。个人观念在章太炎等人那里甚至就是现代历史观的根本否定,在这否定中又包含了对现代的承担与确认。我所描述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内在复杂性和矛盾性,在我的视野中,正是中国思想对现代性的悖论态度。换言之,中国现代思想对“现代”本身既热衷,也狐疑。他们并没有建立完整的现代方案,相反,倒是在悖论中显现了现代性的内在紧张。因此,中国现代思想本身,仍然应该作为我们反思现代性的主要源泉之一。这是我的基本预设。因为我们自己是作为现代思想和文化的产儿对现代进行反思。在我看来,否认这个基本预设,不过是重复现代性的历史叙事,这个历史叙事是以直线进化的时间目的论为基础的,叙述者总是代表未来。

现代化过程最终导致了一个泯灭差异、趋于同一的世界历史进程,但它的主要特征之一却是分化: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的分化,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分化,不同文化集团的分化,知识领域的分化,法律与道德的分化……这种分化是否导致了一种韦伯式的“合理化”的结构,至今并不清晰,遑论“合理化”过程可能带来的新的难以克服的危机。伴随着变革的发展,社会丧失了变革的目的,变革本身成为唯一的目的。现代思想面对的悖论是:一方面,“分化”的过程似乎是一种机械运动,它不能提供社会以某种起码的内在一致性,从而导致寻找目的的行为变成了没有目的的行为;另一方面,以“分化”为特征的社会过程并没有保障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通过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商业、政治和文化过程,人们的生活方式以至想象世界也日益被组织到一种类似机械运动的、同质性程度极高的社会生活形态之中。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寻找

认同的思想过程和社会实践过程因而也是一个悖论式的过程：寻求共识与寻求差异构成了认同问题的两个面向。前者考虑的是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的公共空间及其规则、个人行为能够构成社会行为的条件，后者考虑的是社会群体（如民族、阶级、性别等）及其文化的独特性、个体的差异性及其权利的社会保障条件。在思想的历史中，这些问题又总是被组织到关于自然、社会、民族、国家、阶级和个人等问题的解释之中。换句话说，人们对自然、社会、国家、民族和自我及其相关关系进行不懈的解释，目的正在于建立一种关于合理生活的准则和价值判断。但是，本书的分析已经证明：不仅现代思想中存在着相互歧异、不可通约的世界图景及其构成规则，而且那些较为深刻的思想家个人的思想探索也是悖论式的。因此，探讨产生悖论式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含义，便成为本书的中心任务。

在短暂的学术生涯中，我得到过许多前辈和朋友的帮助。在《无地彷徨》一书的后记中，我曾经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表达我的感谢，这个名单还可以继续延伸下去。在这里，我再一次地对他们表达我的感谢之情。生活在变化，我们自己也在发生变化，甚至友谊和感情也在发生变化。但是，曾经有过的那种情谊、那种坦率的争论、那种因为友谊和学术见解而产生的理解、欢乐、隔膜和痛苦，是我生活中最宝贵的记忆。这种记忆使我在灰色的世界里，体会到了真正的诗意。我将怀着这样的诗意，走人生的长途，继续我的探索。

1995年10月20日于北京古城

132000000

# 目 录

自序 .....	(1)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	(1)
1. 谁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词源及其历史演变 .....	(2)
2. 现代性、新教传统与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研究的方法 .....	(12)
3. 理性化问题与《中国宗教》的论述结构 .....	(16)
4. 对现代化理论的质疑 ——语言的历史约定、文化间的交往行为与社会史方法 .....	(23)
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 .....	(36)
1. 引论：个人、集体与现代认同 .....	(36)
2. 章太炎：个体、自性及其对“公”的世界观的批判(1906年～ 1910年间的思想) ——个体概念为什么是临时性的和没有内在深度的？ .....	(43)
3. 鲁迅(上)：个人、自我及其对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否定与确认 (1903年～1924年间的思想) .....	(117)
4. 鲁迅(下)：自我的困境与思想的悖论 ——“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1920年～1936年间的思想) .....	(159)

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	(208)
1. 中国近现代思想中的“科学”概念及其使用·····	(208)
2. 吴稚晖与中国反传统主义的科学观·····	(270)
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306)
1. 引言·····	(306)
2. “五四”启蒙运动的“态度的同一性”·····	(307)
3. “五四”启蒙运动的意义危机·····	(319)
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	(341)
1. 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政治与文学问题·····	(343)
2. “地方形式”概念的提出及其背景 ——战争对乡村与都市关系的重构·····	(346)
3. “地方性”与“全国性”问题·····	(350)
4. 方言问题与现代语言运动·····	(353)
5. “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否定之否定·····	(371)
主要著述一览表·····	(376)

# CONTENTS

Preface .....	( 1 )
一、 Weber and the Ques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	( 1 )
二、 Sources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	( 36 )
1. Introduction: Individual, Group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n Identity .....	( 36 )
2. Zhang Taiyan: Geti (individual), Zixing (essence of self) and the Critique of the World View of "Gong" (1906~1910) .....	( 43 )
3. Lu Xun (part one): Individual, Self and the Paradoxical Attitude to the Conception of History of Enlighten- ment (1903~1924) .....	(117)
4. Lu Xun (part two): the Predicament of Self and the Paradox of Thought: Being in but not Belonging to Two Societies (1920~1936) .....	(160)
三、 The Idea of Sci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	(208)
1. The Conception of Science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	(208)
2. The Use of a Scientific World View in a Critique of	

Tradition in the Work of Wu Zhihui .....	(270)
四、The “May Fourth”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	(306)
1. The “Identity of Attitude” of “May Fourth” Enligh- tenment .....	(307)
2. The Crisis of Consciousness of “May Fourth” Enligh- tenment .....	(319)
五、Local Form, Dialects and the Discussion on “National Form”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	(341)
Catalogue of Main Works .....	(376)

##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马克斯·韦伯把社会的理性化过程视为“目的—工具合理性”（purposive-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日益增长的霸权：理性的胜利没有带来预期的自由，却导致了非理性的经济力量和官僚化的社会组织对人的控制。这一理论的洞见一方面直接影响了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对启蒙与现代性的理论批判，另一方面启发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交往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及其对现代性的思考。正由于此，韦伯至今仍然是当代社会思想的灵感的源泉，一位学者用两句话概括当代西方社会学的主要特征，即“韦伯的马克思主义化或马克思主义的韦伯化”。韦伯理论的当代性来自他提供了对现代性及其问题进行反思的理论出发点和历史性的预见，即通过对社会的理性和理性化的反思来诊断当代社会的主要危机。但是，在阅读了韦伯有关中国宗教的著作《儒教与道教》（Konfuzianismus und Taoismus）——这本书刚刚被译成中文出版——之后，我完全不能从中发现他对理性化过程所作的悲观主义预见。恰恰相反，理性和理性化成为描述和诊断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规范。如果说现代思想从两个方向——即批判理论的方向和现代化理论的方向——上发展了韦伯理论的话，那末很显然，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对韦伯的利用主要在后一方面。本文的主旨不是对韦伯的主要范畴作社会学理论的分析 and 解说，甚至也不是对他有关



中国历史的许多历史细节的不准确描述进行辨正；我的目的毋宁是说明隐藏在韦伯社会学的基本范畴背后的历史性，以及这种历史性如何限制了这些范畴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和诊断的能力。在这里，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的反思（这种知识体系经常表现为对现代性的批判）。通过这种反思，我想暗示的是，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及其问题的分析首先需要置于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并致力于寻找相应的历史范畴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从而反思地对待我们的社会科学立场，这样才有可能把中国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问题来研究。

## 1. 谁的现代性？

### ——现代性的词源及其历史演变

现代性的词源学证明：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性概念；通过词义由贬到褒的历史转变，现代性话语重构了人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启蒙运动制造的现代性话语是建立在不可逆转的时间意识之上的历史目的论的承诺，其核心是“理性”与“主体的自由”；现代性话语利用理性、主体的自由等普适性概念及其反宗教姿态遮盖了它与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联系。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是一个内含繁复、聚讼不已的西方概念。只有一点非常明确，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按照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研究，英语中的modern一词的直接来源是法语中的moderne和意大利语中的modernus，词根起源于拉丁语modo，意义只是现在的意思，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现在或当下(now, contem-